

李
理
于
颖

后金云板纵横谈



沈阳故宫藏后金天命年制云板

沈阳故宫博物院现珍藏有一件后金天命年间（1616～1626年）所铸铁质云板，距今已有380余年的历史，可谓历经岁月，饱受沧桑。因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后金云板作为八旗官兵守边报警的工具以及后金宫廷内传递信息的器具，为维护其政权稳定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云板的使用并不是由后金时期的女真人首创的，其最早使用的年代远在唐代之前，并且至少到宋代，云板已作为一种报时工具使用在宫廷中。从云板最初的使用功能看，它是源自汉民族传统的佛教法器，即是从宗教器物引入到宫廷和军事之中的。

至今，云板作为佛教寺庙里的常用法器仍在被使用，南北各地的佛寺里依然回响着云板的叮当之声。由此看来，后金天命年间铸造并使用的云板，应是我国古代云板在特定时期的特殊使用形式，是后金汗努尔哈齐吸收汉族传统器物，将其灵活运用于战争的一个体现，反映了女真（满）族人崛起之际兼收并蓄的开放意识。正是通过大量吸收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传统文明和传统器物，后金（清）王朝才得以迅速壮大并很快走向成功。

透过后金云板上深浅不一的斑斑锈痕，我们似乎又回到明末清初那段金戈铁马的悲壮岁月。那些精美的花卉纹饰，那些工致的阴阳铭文，让我们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美好：即使是在残酷惨烈的战争时期，无论是敌人还是自己都依然对生存充满希望，对身边的美好事物充满期待。人们在传递军情信息的云板上铸以盛开的鲜花，在冰冷而坚硬的板面上饰以曲折的枝



南宋云板形铜镜

蔓、舒展的宽叶……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当代人得以享受幸福和安宁的本源，是我们今天得以触摸古代传统文明的一个物证。

古代云板的多种用途

云板，亦写作“云版”或“云钹”，俗称“点”。为一块两端呈云头状的扁形铁板，上部制有一圆孔，系绳悬于木架上，敲击可发声，以传递声讯或约集众人。

云板在我国使用的历史极为久远，在唐代之前即已有应用。至宋代，云板除了应用于寺庙里，在宫廷中也有皇帝御用的记录。在民间，云板造型还被用于其他器物，如制成云板形铜镜，等等。从宋、元、明、清各朝的传世云板看，大多铸造精细，纹饰精美，其外观和工艺绝不逊色于其他珍贵的艺术品。

古代云板的使用范围较多，主要分为以下三种形式：一是用于佛教寺庙中，二

是用于皇家宫廷或官署衙门之内，三是用于王公贵族或宦士绅的府宅。

其一，云板在佛教寺庙内使用时，可分为铁板和青铜板两类，均是佛寺中的“呗器”，亦即“法器”（佛寺中另外悬有大量木板，其作用与金属云板大同小异，但其造型基本呈方形，与云头状金属板不同）。它们或用于僧徒早课，以敲击云板计时颂经；或用于僧徒餐前，起到召集众人的目的。总体来看，云板在佛教活动中是一种约集众人的专用器物。

由于云板在诸多佛事中被广泛应用，在寺庙各处也多有悬挂，如在“库司”前悬挂的称为“大板”，在“方丈”前悬挂的称为“内板”，在“半钟”之下悬挂的称为“钟板”，另外按不同的使用功能又可称为“首座板”、“照堂板”、“客板”、“坐禅板”、“斋板”、“巡火板”、“火板”、“报廊板”等等。各处使用云板，都有它“饮食起居、行道办事、规矩礼法”上的警示作用。

至于云板的具体使用方法，各朝代、各地区及各寺庙均有不同规定，其敲击方式也不尽相同。据日本佛教著作《洞上伽蓝杂记》所载：“禅堂内外及方丈库院，处处悬挂大板、小板。随时依事，或击一下、二下、三下，乃至长击，用以报众。诸清规中，有其定则。”（转引自《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其二，云板在古代皇家宫廷或官署衙门内使用时，通常是作为一种报时或报事的信号，也有的是作为一种约众集合的号令，起着与古代鼓、角相同的作用。

从相关史籍看，唐至五代时，云板在



清顺治年间铸造的铁云板（现悬挂于北京法源寺院中）

北方宫廷中即有使用。至宋代初年，云板已成为皇帝御用之物。据《俗事考》所载，宋太祖赵匡胤在宫中“以鼓多惊寝，易以铁磬”，“此更鼓之变也。或谓之钲，即今云板也”（转引自《中华佛教百科全书》）。这种做法自然会影响到后世宫廷及官署衙门对云板的应用。

据元代关汉卿杂剧《望江亭》第四折所记，剧中人物杨衙内赶至潭州白士中任所，欲治白士中之罪，在双方论理时招谭记儿到场，白士中即令左右衙役：“击云板，后堂请夫人出来。”反映此时云板在官署大堂已是常备的一种器物。

其三，云板在王公贵族、官宦士绅之家使用时，按实际情况具有较多的实用方式，如传事、报信、奏闻等等。这一点从古代诗文、著作中可看到较多描写。如明

代表宏道《病起》诗言：“愁听传事板，懒答问安书。”此传事板，系指云板。又明代阮大铖著《燕子笺·试寝》记载：“内打云板三声，吆喝开门介。”清代俞万春所著《荡寇志》第九十二回记载：“左右不敢怠慢，忙传云板，教请张相公入见。”可见，云板在古代各朝主要是贵族官宦人家通报信息的器物。

另据清代曹雪芹所著《红楼梦》第十三回记载：“凤姐还欲问时，只听二门上传出云板，连叩四下，正是丧音，将凤姐惊醒。”说明到清代中晚期，云板在王公贵族之家也被作为死人报丧用的

响器。这些内容都反映出古代云板在各历史时期曾于官宦人家广泛使用的史实。

后金至清代云板的使用

后金时期，女真人使用云板的时间较早，应是在其建国之前，即由佛教寺庙中所用法器或明朝官署中所用传讯器为其采纳而来。

明朝末年，在辽东各地曾建有许多汉人的佛、道教寺庙，而女真人很早就已信奉佛教，在赫图阿拉城定都时即建有“七大庙”等宗教场所。当八旗军攻入辽沈地区后，努尔哈赤为避免军兵在战争中毁损寺庙，还曾专门发布命令对佛寺多加保护。如天命六年（1621年）十一月，努尔哈赤传谕：“任何人不得拆毁庙宇，不得于庙院内拴系马牛，不得于庙院内便溺。有

违此言，拆毁庙宇、拴系马牛者，见即执而罪之。”（《满文老档》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注，中华书局，下同）女真统治者对汉人所建佛教寺庙如此尊重，各寺庙中的云板等宗教法器也自然成为他们接纳和使用的对象。

从后金时期使用云板的史实情况分析，当时云板主要用于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用于军事，是八旗官兵在前线守卫台堡时逐级报警、传达敌情的专用工具；另一种是用于后金都城及宫廷中，将云板置于宫门或内廷，使其成为汗王和御门侍卫传报信息的工具。

据《满文老档》记载，后金建国不久，八旗官兵已将云板明确用于战事。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九月，明军数百人出抚顺关，乘黎明前昏暗攻袭女真人守地，“时（八旗军）台卒见民兵出边，击云板告警，东方悬云板处见之后，亦击云板相传。日将出山而未高起之前，即传至汗城。汗（努尔哈赤）往祭堂子后，闻击云板，遂携大贝勒（代善）及其诸弟率城中所有马兵，立刻起行”。

后金天命六年，努尔哈赤统帅八旗军先后攻陷沈阳、辽阳等辽东重镇，并很快将国都迁往辽阳城，一年后营建辽阳新城东京城。1625年，因战争形势的需要，努尔哈赤又将都城迁往沈阳城（以后改称盛京城），在城中修建了汗王宫以及盛京皇宫东侧的大衙门（大政殿）、十王亭等一系列宫殿建筑。在努尔哈赤迁都辽沈地区后，由于采取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遭到辽东汉人的强烈反抗，在辽南、辽西等地

又有明朝残余部队和来自海上的明军攻击，这就使后金统治地区局势不稳，警报频出，因此作为报警用具的云板在此时被广泛地应用，成为后金国中十分重要的军事装备。

八旗官兵通过在战争中长期使用云板，逐渐形成较固定的敲击模式，努尔哈赤对此给予肯定，并将云板的具体用法按制度形式予以公布。天命六年十一月，努尔哈赤向前线守卫各台站官兵降谕：“……无论何台人发现敌至，即行放炮、举燧、击牌（板）。不论边外、边内，见敌一二百，则举一燧、放一炮、缓击云牌（板）；夜间，则燃一号烟。倘有一二千人，则举二燧、放二炮、急击云牌（板）；夜间，则燃二号烟。倘有万余人，则燧尽举、炮连放、云牌（板）连击；夜间，则烽火全燃。见敌兵进入之时，当即向各台人报警，各台人均照首先受敌之台人举燧、放炮、击云牌（板）和燃烽火，以使国人知之。报警一次后，仍未见敌之台人，勿再妄行放炮。其见敌之台人，仍须放炮、击牌（板）勿绝，夜则燃烽火。敌进何处，凡所见之台人，亦放炮以应，我军可闻炮声往寻之。不然，胡乱放炮，则难知敌在何处。不举燧、不击云牌（板），台人不放炮，仅由城堡之炮酌放之，闻其声岂不以为乱战耶？”（《满文老档》上）

后金时期，云板除被八旗军广泛用于战争之中，还被努尔哈赤应用于宫廷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汗宫内外重要的通讯器具。

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努尔

哈赤定巴牙喇（护卫亲兵）值班制度，规定：“巴牙喇之值班人等，待门开后始得入坐。仅限值班人等，他人不得入内，守门人亦不得入内。（值班人等）坐于门，鸣板召之，乃入。鸣板毕，即出……”（《满文老档》上）说明此时云板已明确用于内廷，成为后金汗王身边的御用器物。

由于战争时期军务紧急，国中经常会有特殊战况上奏汗王。为使军政大事迅速上达，努尔哈赤在汗宫大门处也悬挂有云板，以便诸臣能将战况及时告知自己。天命十年（1625年）四月，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刚刚迁都沈阳不久，因国中时局紧迫，他即传谕：“‘夜间有事来报，军务急事，则击云板；逃人逃走或城内之事，则击锣；喜事则击鼓。’完后，汗之门置云板、锣、鼓（原注：时因粮荒，逃叛者纷纷作乱）。”（《满文老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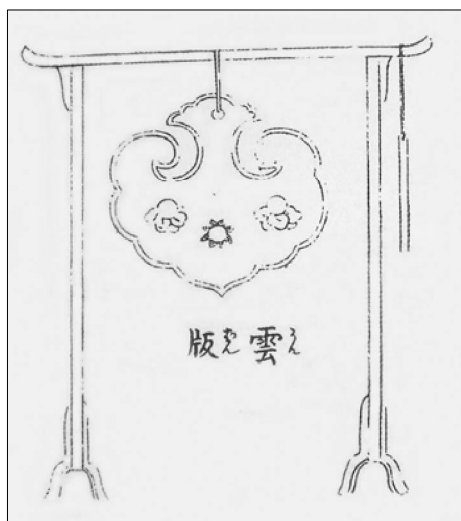
可见，古代各朝使用的传统云板经过女真统治者的改用，在后金至清初开国战争中发挥出巨大作用，这反映了女真（满）族人崛起之际对古代传统器物、用具的大胆吸收与充分利用。

1627年，皇太极登上汗位，是为天聪汗；1636年，他被尊为“宽温仁圣皇帝”，并正式将国号改为“大清”，将女真族名改称“满洲”。皇太极执政期间，一方面全力发动对外战争，将东西部前线拓展到朝鲜境内和明朝山海关以内，另一方面则按明朝旧制在国内加快封建化进程，使清王朝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国内局势大为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战时报警用具和宫廷中传讯工具的云板便逐

渐失去使用价值，而被更规范和更严格的层层上奏制度所取代。这样，在清朝正式建国前后，云板实际上已慢慢退出国家用器的舞台，又转变成各佛教寺庙内悬挂的法器或地方官府、官宅的传讯器物，其用途又转为较单一的形式。

清军入关后，宫廷中已完全见不到使用云板的记载，在各地寺庙中，则继续制造和使用着铜制、铁制的云板，使这种传统器物得以一直流传下去。至今，在北京法源寺中仍保留着一件清初顺治年间所铸铁质云板，其铸造技术十分精湛，反映出那一时期高超的生产技术和人们的精神追求。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佛寺中的云板器物通过中外人士交流，还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有的甚至被该国的寺庙所采用。如清代乾隆晚期，日本德川幕府官员通过向中国赴日商人访谈，而精心编制成《清



清乾隆年间日本人根据清人所述绘画的南方寺院中的云板，引自《清俗纪闻》。

俗纪闻》一书，该书对中国江浙、闽粤一带的民间习俗和各种用具予以记录和绘图，其中有关佛教寺庙的内容中，即有南方佛寺所悬用的云板图案，这为我们研究清代中期南方云板造型以及中国古代器物向海外的传播，都提供了直接依据。

沈阳故宫珍藏的云板及国内寺庙云板拾零

沈阳故宫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执政时营建的宫殿（清代乾隆年间又有所增建），这里保存着清朝开国皇帝征战使用的御用武器以及后金至清初时期八旗官兵的一些军事装备，成为国内外研究清初历史、宫廷史的重要物证。

在沈阳故宫所藏清初传世文物中，有一件“大金天命年铸”铁制云板，因目前国内带有后金确切纪年的传世文物较为稀少，云板又曾在后金开国战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故该云板于1993年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此件云板以生铁一次铸造而成，全高55.5厘米，上宽36厘米，下宽44.5厘米，厚1.2厘米，共重12.5千克。云板中间的板身呈长条形，上下部均铸成云朵形状，上部云头略窄，下部云头略宽，表面制有微凸的卷草花纹，云头顶部各铸有一朵凸起的团花，下部云朵中央制一大朵团花，花卉中心铸成圆形凸点，为敲击之用，凸点周围饰以层层花瓣。板身正面的中间部位铸有汉文，右侧为楷书双勾体“大金天命癸”，左侧为楷书阳文“亥年铸牛庄”，两行文字之下单铸楷书阳文“城”字。云板上部中间制有一圆孔，为当时系绳悬挂所

用。

“大金天命癸亥年”，即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此时，努尔哈赤已于东京城（辽阳城）定都两年，正面临着明军在辽东的残余部队不断袭扰、国内汉人不断反抗和逃亡的窘境。努尔哈赤在这时命人铸造云板，当与其维护国家安定、控制动乱局面有直接的联系。

云板上所铸的“牛庄城”，位于今天辽宁省海城市辖内。据《满文老档》记载，后金攻占辽东地区后，曾在辽南的石城、牛庄城、沙井等地，利用汉人工匠进行冶铁和铸造，以生产本国需要的长短兵器、火炮及农具等器物。当时八旗驻防官兵报警和宫廷内传讯的云板，即在天命八年前后在牛庄城大量铸造而成。

由于云板在后金时期是重要的实战用器物，分置于八旗驻防军的各地台堡之内，加之云板均为生铁所铸，不易长久保存，因此至今能够完好传世的云板极为稀少。沈阳故宫现藏的后金天命年铸云板于1955年发现于海城市内，因实物源自铸造地，故更具有传世文物的真实性。

从沈阳故宫所藏后金云板的制造工艺来看，无论是其样式还是图案，皆具有浓厚的汉民族文化气息。除了云板上铸刻的铭文为标准的阴阳汉字外，其上的花纹图案也均属于汉族传统纹样，反映出这类铁铸器物确实为辽东汉族工匠所制造。

沈阳故宫珍藏的后金云板因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极其珍贵，而成为古代各朝传世云板的一件标准器。除此之外，在全国各地博物馆、佛教寺庙中尚有一些宋、

元至明、清时期的云板器物，这些传世品少数用于官署，多数用于寺庙，其造型和材质大同小异，反映出中国古代云板在代际传承与制作工艺上的同一性。如北京法源寺所悬挂的“顺治年铸”云板、2003年于河南邓州市发现的“元代皇庆二年款”云板等等，均是古代传世云板的较好典型器。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云板除古代传世品外，还有全国各地佛教寺庙里的现代新式云板，如在北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江西、福建、广东及内蒙古、吉林等地的佛寺里，悬挂着大量与古代云板造型近似的当代云板，它们由当代工艺制成，云板表面所铸文字充满现代气息。综合来看，这些寺庙中所使用的云板保持着古代云板的基本造型，它们大致可分为南、北两种形制，其中北方寺庙使用的云板体量略大，表面制作较粗陋，上下部云朵外形较宽；南方寺庙使用的云板体量略小，表面制作精细，但上部云朵通常较小，与下部宽大的云朵形成反差，从而形成了上小、下大的云板形制。

至今所见较典型的现代佛寺使用金属云板有：北京广化寺云板、河北张家口市鹿县黄羊山清凉寺云板、陕西法门寺云

板、重庆慈云寺云板（当地俗称“火点”）、泉州市佛光山寺云板、广州市六榕禅寺云板，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河北张家口市鹿县清凉寺云板与沈阳故宫现藏后金云板在外观上看，两者极其相似，甚至达到神形兼似的程度，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后金云板的直接传承提供了佐证。

据明末清初一些历史文献、档案等记载，明朝末年，长城关内的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商人、农民、工匠曾不断流入辽东，以后即定居此地，为辽东地区带来许多汉族传统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甚至佛教用器具。较为典型的是山西建筑工匠、制瓷工匠定居辽东后，曾在辽南海州等地烧制五彩琉璃砖瓦及绿釉碗、盘、碟、缸等陶瓷器，其他汉人则在辽南冶铁并铸造铁制工具、武器等器物。后金占据辽东之后，这些原籍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工匠有的死于战乱，有的逃亡关内，有的则被女真人掳获，被迫从事冶铁、淘金、制瓷、烧造琉璃砖瓦等手工生产。这样，源自山西佛教寺庙的云板，或是在辽东的佛教寺庙为后金掌握，或是由山西匠人按旧式形制直接铸造，才形成了后金时期在八旗军驻防台堡和宫廷内广泛使用云板的状况。

从后金云板与中原地区古代、当代云板形制的相似性来看，后金乃至清朝的器物实际传承着中国古代器物的余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我们为之骄傲的人类文化遗产。

作者单位：沈阳故宫博物院



河北省张家口市鹿县黄羊山清凉寺现代云板